

論思想文化轉型下的「雅」、「俗」矛盾及其對宋詞題材構成的影響

◎ 許伯卿

目前，學術界對催生詞體成長的文化學基礎，已有了一些比較深入的研究，比如從市井風俗及歌妓制度入手進行考察等；但是，詞體的成長還有更為深刻和繁複的社會文化背景。本文旨在通過考察分析由於宋代國家制度轉型而催生的社會文化諸方面的「雅」、「俗」矛盾，以及這些矛盾因素的綜合作用，來認識「雅」、「俗」變奏對宋人詞體觀念所構成的深刻影響，進而瞭解這種影響在宋詞題材構成上的反映。

一、國家制度的轉型導致思想文化的轉型

恩格斯曾說：「歷史是這樣創造的：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志的相互衝突中產生出來的，而其中每一個意志，又是由於許多特殊的生活條件，才成為它所成為的那樣。……每個意志都對合力有所貢獻，因而是包括在這個合力裏面的。」①在構成「合力」的諸「意志」中，國家制度無疑是最具影響力的一種。夏承焘

先生論詞絕句《北宋詞風》云：「九重心思共誰論，酒畔兵權語呴吞。說與玉田能信否？陳橋驛下有詞源。」②夏先生的詩論，言簡意賅卻一針見血地揭示出了北宋詞風形成的根由。

現在已極少有學者否認，西元七五五年所發生的「安史之亂」，導致了一場國家制度的危機；而天水一朝抑武右文國策的確立，乃基於對晚唐五代藩鎮割據前車之覆的鑒戒，偃武修文成為此後整個國家制度和民族文化化的準星。司馬光《涑水記聞》卷一、邵伯溫《邵氏聞見錄》卷一和《宋史·石守信傳》等均有宋太祖「杯酒釋兵權」的記載。既抑武將，乃重文臣，文士和文官於是多起來。《宋史·文苑傳序》云：「自古創業垂統之君，即其一時之好尚，而一代之規模，可以預知矣。太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奪武臣之權，宋之尚文，端本乎此。太宗、真宗其在藩邸，已有好學之名，作其即位，彌文日增。自時厥後，子孫相承，上之為人君者，無不典

學：下之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錄，無不擢科，海內文士彬彬輩出焉。」如果說開國之君宋太祖的做法主要是出於鞏固帝祚的陰暗心理，那麼承平之君宋太宗已是主要從安邦治國的角度來考慮了。李焘《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三云：「朕每讀《老子》至『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用之』，未嘗不三複以為規戒。王者雖以武功克定，終須用文德致治。」抑武右文、以文馭武國策的確立，使文化和文人獲得了全社會的普遍尊重，而日益寬鬆的科舉取士制度又為廣大讀書人大開入仕進取之門。據張希清先生《北宋貢舉登科人數考》一文統計，北宋取士總數達六萬餘人，每年達三六〇人^③。總之，誠如蔡襄《蔡忠惠集》卷二二《任材》篇所云：「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詞進。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錢穀之司，文士也；邊防大帥，文士也；天下轉運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雖有武臣，蓋僅有也。」或如《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二一文彥博所云，宋朝「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

宋代不僅大量重用文士，而且給予他們非常優厚的待遇。宋廷對文官的禮遇在以下三個方面表現得最為明顯：一是執掌權柄。《宋史·太祖本紀三》云：「乾德改元，先論宰相曰：『年號須擇前代所未有者。』三年，蜀平，蜀宮人入內，帝見其鏡背有志『乾德四年鑄』者，召寶儀等詰之。儀對曰：『此必蜀物，蜀主嘗有此號。』乃大喜曰：『作相須讀書人。』由是大重儒者。」全國統一後，宋廷為避免重蹈晚唐五代藩鎮權重、君

弱臣強的覆轍，規定軍隊高級將領心須由文人充任。同時規定州郡長官也必須由文人擔當，又另設通判，以相互鉗制。全國各州郡的財賦刑法等事務，也改由另外設置的各路機構專門管理。多管齊下，把所有主要權力收集到中央，如朱熹《朱子語類》卷一二八所云：「本朝鑒五代之弊，遂盡奪藩鎮之權，兵也收了，財也收了，賞罰刑政一切都收了。」「於是使文臣知州，以朝官知縣，以京朝官監臨財賦，又置通使，置通判，皆所以漸收其權。朝廷以一紙下郡縣，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無有留難，而天下之勢一矣。」^④而由於廣開科舉之門，「三百餘年元臣碩輔，鴻博之儒，清強之吏，皆自此出」。^⑤二是俸祿豐厚。高官之外，宋代還實行「重祿法」，以厚祿籠絡文士，兼期養士之忠廉。清人趙翼《十二史劄記》卷二五「宋制祿之厚」條云：「其待士大夫可謂厚矣」，「恩逮於百官者惟恐其不足」。同卷「宋祠祿之制」條又云：「宋制，設祠祿之官，以佚老優賢。」「宋恩賞之厚」條又云：「宋制，祿賜之外，又時有恩賞。」「宋恩蔭之濫」條則感慨云：「朝廷待臣下固家優恤，乃至如此猥濫，非惟開倅進之門，亦徒耗無窮之經費。」這一點，連宋人自己也承認。王栐《燕翼詒謀錄》卷五即稱：「國朝待遇士大夫甚厚，皆前代所無。」石介《徂徠先生論文集》卷九《養說》亦云：「古之養士也薄，今之養士也厚。」《宋會要輯稿·職官三》引王岩叟語云：「三省胥吏，歲累優秩，日給肉食，月享厚祿，寒暑有服，出入乘官馬，使令得管卒，

郊禮沾賜，又許引有服親為吏，如士大夫任子無異。「豐厚的俸祿收入，在客觀上使宋代士大夫擁有了縱情聲色、奢侈享樂的物質條件。三是言論自由。宋代的言論自由，源自宋廷抑武右文的基本國策。《宋史·曹勳傳》、《宋人軼事彙編》卷一所引陸游《避暑漫抄》、王明清《揮麈後錄》卷一、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四、周煥《清波雜誌》卷一等文獻中，均有宋太祖立誓碑不殺士大夫的記載。「自太祖勒不殺士大夫之誓以詔子孫，終宋之世，文臣無歐刀之辟。」^⑥因為無性命之虞，宋代的文人敢於議論朝政，犯顏直諫。《蘇軾文集》卷一〇《上神宗皇帝書》即云：「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爭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即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即宰相待罪。」發展到後來，連太學生也敢直言不諱地指斥時政。羅大經《鶴林玉露》丙編卷二云：「太學，古語云：『有發頭陀寺，無官御史台。』言其清苦而鯁亮也。……國有大事，鯁論間發，言侍從之所不敢言，攻台諫之所不敢攻。由昔迄今，偉節相望。」文官即使犯了罪，至多也只是發配、流放到偏遠的蠻荒之地，而且還有東山再起的機會。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抑武右文之制一出，中國社會思想文化從此發生根本性的轉型。從唐朝到宋朝，中國封建社會由尚武轉向習文，由拓展轉向內斂，亦由強盛轉向衰敗。張毅先生替我們做了很好的小結：「政治

的保守，軍事的無力，使得整個封建集團再也沒有唐人那種追求建功立業的宏偉氣魄，沒有「寧做百夫長，勝過一書生」和「萬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的豪邁氣概。時代精神趨於向內收斂而不是向外擴張，土人心理喜於深微澄靜而不是廣闊飛動。」「由於向內收斂，宋代文人的心理一開始就往細膩、敏感、深微處發展，失去了唐人的豪放、自信和開朗，有一種回避現實反歸內心的傾向。」並明確指出：「詞這一藝術表現形式之所以能繼詩之後在宋代放出異彩，這也是一個重要原因。」^⑦其實，何止是「一個重要原因」；「陳橋驛下有詞源」，如夏承熹先生所提示的那樣，宋代國家制度的轉型正是宋代思想文化轉型的根本原因，而宋詞則是這個轉型期人們生活狀態的生動記錄和思想感情的深刻流露。

二、多重「雅」、「俗」二元矛盾是宋代思想文化轉型的表現形式

宋代國家制度轉型所催生的文化轉型，集中表現為「雅」與「俗」的矛盾。不過，這種「雅」和「俗」的矛盾的催生和演化，需要多種社會因素的綜合作用，才能實現；或者說，這種「雅」、「俗」矛盾，會通過多方面的社會生活反映出來。具體而言，包括以下數方面的內容：

首先，宋代文士的階級構成發生了變化，其主體成為先天具有「雅」、「俗」矛盾性格的庶族。

鄭樵《通志二十略·氏族略》序云：「自五季以來，取士不問家世，婚姻不問閥閱。」由於門閥士族沒落，士庶界限消失，特別是科舉取士制度的規範和完善，宋代廣大中小地主甚至工商業者和自耕農，都獲得了讀書應考的進取機會；這些人崛起於社會中、低層，思想情感都比較開放自由，與之相應，很多人性格中難以避免地帶有來自下層社會的流俗氣息，易於出現「下躁儻張」、「淫泆浮曼、矜誇傲辟」、「爭名競利」諸毛病^⑧。連歐陽修也曾作詩勸人：「折腰莫以微官恥，為政須通異俗情。」^⑨

庶族官僚階級一方面恪守封建政教所規定的倫理道德，另一方面又自覺不自覺地時常顯露出流媚俗的情趣，成為「雅」、「俗」二元矛盾對立統一的社會精英文化主體，在生活中經常扮演相互矛盾的角色。周煥《清波雜誌》卷一〇云：「韓黃門持國黃藩，觴客，早食則凜然談經史節義及政事設施；晚集則命妓勸飲，盡歡而罷。」彭乘《墨客揮犀》卷八云：「程丞相性嚴毅，無所推下。出鎮大名，每晨起，據案決事，左右皆惴恐，無敢喘息。及開宴召僚佐飲酒，則笑歌歡譎，釋然無間。」《宋人軼事彙編》卷一二云：「東坡生平不耽女色，而亦與妓遊。凡待過客，非其人，則盛女妓絲竹之聲，終日不輟，有數日不接一談，而過客私謂待己之厚。有佳客至，則屏妓銜杯，坐談累夕。」發展到後來，有人已成為多位元一體的性格組合型人物。楊萬里《誠齋集》卷九七《張功父畫像贊》即云：「香火齋祓，伊蒲

文物，一何佛也。襟帶詩書，步武瓊瑤，又何儒也。門有朱珠，坐有桃李，一何佳公子也。冰茹雪食，凋碎月魄，又何窮詩客也。約齋子方內歟？方外歟？風流歟？窮愁歟？老夫不知，君其問諸白鷗。」楊萬里評張鎔之語，正可看作是對多種「雅」、「俗」矛盾在宋代士人身上對立統一情形的生動描述和高度概括。

其次，恪守封建政教、注重修身養性與放縱情欲本能、享受日常生活的「雅」、「俗」矛盾。

宋代是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封建王朝，與這種政治需要相一致，在思想文化建設上十分強調「大一統」的觀念；但國家在軍事上的軟弱無能，不僅使多次收復邊疆故地的戰爭均告失敗，而且使宋人飽嘗覆國失地之痛，憂患和屈辱如影隨形。出於一種補償心理，宋人特別重視思想文化的建設，在政治上強調「正統」，在思想上強調「道統」，在文化上強調「文統」，並形成一種新的儒家思想體系，這就是「理學」，或稱「道學」。理學受到趙宋統治者的極端重視，被奉為「正理」，成為趙宋的「國學」。

有崇文重土的國策，有嗣聖明道的理學，有歷代帝王的提倡和表率，天下文士遂多自知奮勵，以求仕進，以長學識，誠如王栐《燕翼詒謀錄》卷一所云：「聖朝廣開科舉之門，俾人人皆有覬覦之心，不忍自棄于盜賊奸宄。」與前代文士相比，宋人的知識文化水平大幅度提升，每以「洞古博物」、「博學多聞」等詞語相稱賞，以學識淵洽相尚，而譏笑才疏學淺者。清人潘永因《

宋稗類鈔》卷六載「荊公素輕沈文通遺，以為寡學」、富弼譏黃庭堅「原來只是分寧一茶客」，卷五載劉原父嘲歐陽修「可惜不甚讀書」。除應考的儒家經典外，舉凡天文、地理、土風、民俗、園林、丹青、翰墨、金石、考古、文藝、娛樂、丹方、雜技等世間幾乎一切學問，皆在宋人研習、推究的範圍之內。王安石就宣稱：「某自百家諸子之書，至於《難經》、《素問》、《本草》、諸小說，無所不讀。」⁽¹⁰⁾

與追求功名富貴相聯繫，宋代文士比前人更注重娛樂享受。禮遇和厚祿，固然培養了不少忠勇報國之士，但也使許多人染上奢侈享樂的惡習；加上宋太祖「杯酒釋兵權」時「多積金銀，厚自娛樂」的倡導，宋代官僚階層的生活私欲日漸膨脹，放情縱欲之風彌漫上下。沈括《夢溪筆談》卷九即云：「時天下無事，許臣寮擇勝燕飲。當時侍從文館士大夫為燕集，以至市樓酒肆，往往皆供帳為遊息之地。」唐代文士每以立功邊陲、馬革裏屍為遠志，尚武風習猶濃；宋代的文士則多以功名富貴、娛樂享受為常理。《宋稗類鈔》卷二記載宋祁元宵徹夜狂歡而遭其兄宋庠批評：「聞昨夜燒燈夜宴，窮極奢侈。不知記得某年上元，同在某州州學內吃齋煮飯時否？」宋祁竟反駁：「不知某年同某處吃齋煮飯是為甚底？」大、小宋不同的人生觀，正可以分別看作恪守道德規範與放縱情欲本能兩類不同人物的典型。即使是呂蒙正、李綱這樣的名臣，也不例外。《宋人軼事彙編》卷四云：「呂文穆微時極貧，比貴盛，喜食雞舌湯，每

朝必用。一夕遊花園，遙見牆角一高阜，以為山也，問左右曰：『誰為之？』對曰：『此相公所殺雞毛耳。』

「卷一四云：「李綱私藏，過於國帑，侍妾歌童，衣服十擔。」也許正是因為有了許許多多宋祁式的人物，才有了李觀迥異于儒家傳統的利欲觀。《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二九《原文》有言：「利可言乎？曰：人非利不生，曷為不可言？欲可言乎？曰：欲者人之情，曷為不可言？言而不以禮，是貪與淫，罪矣！不貪不淫，而曰不可言，無乃賊人之生，反人之情？世俗之不憲儒以此。」

我們雖然不能說李觀的出發點就是為放情縱欲者尋根、張目，但其利欲觀的產生，卻不能不受現實生活中奢侈享樂之風的影響。

第三，商品經濟的發展不斷改變著士人的價值觀，看重金錢和享樂的「利欲觀」被越來越多的士人接受；同時，經濟的發展、城市的繁榮、教育的普及，也使市民階層有了瞭解、學習甚至經營文化的機會和本領；而歌妓作為市民階層中的特殊群體，更直接扮演了使「雅」、「俗」文化相通互補的角色。

宋代經濟空前發展，無論是農業、手工業、國內商業、對外貿易，都有長足的進步。其中，商品經濟的繁榮，不僅為更多人讀書進取提供了經濟保障，而且使人們的競爭意識空前增強。同時，由商品經濟催生的豐富多彩的城市生活，還在客觀上為宋代文士從流媚俗、放情縱欲，提供了豐富的物質基礎。尤其是那些出身寒微

的農家子弟，極易受城市生活的誘惑。司馬光《傳家集》卷四八《乞省覽農民封事劄子》有云：「切惟四民之中，唯農最苦，……故其子弟遊市井者，食甘服美，目睹盛麗，則不復肯歸南畝矣。至使世俗俳諧，共以農為嗤鄙。誠可哀也！」儒家倫理道德以農耕文明為哲學基礎，對農民的嘲謔，其實質就是對傳統封建禮教根基的侵蝕。基於此，許多正統的士人對市民文藝的非正統性深表憂慮和憤慨。《新唐書·郝處俊傳》云：「彼俳兒優子，言辭無度，爭負勝，相譏謔，非所以導仁義，示雍和也。」吳自牧《夢梁錄》卷一九云：「瓦舍者，謂其『來時瓦合，去時瓦解』之義，易聚易散也。不知起於何時。頃者京師甚為士庶放蕩不羈之所，亦為子弟流連破壞之門。……今貴家子弟郎君，因此蕩遊，破壞尤甚於汴都也。」

另一方面，中上層文士的介入，也使市民文藝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乃至由「俗」趨「雅」，變「俗」為「雅」。據周密《武林舊林》卷六，「戶部點檢所」設「官庫」，「每庫設官妓數十人，各有金銀酒器千兩，以供飲客之用。……官中趁課，初不藉此，聊以粉飾太平耳。往往皆學舍士夫所據，外人未易登也」。姑就詞體而言，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三所載西夏歸朝官「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之語，曾敏行《獨醒雜誌》卷三所載遲卒傳唱蘇軾「燕子樓」樂章，於徐州城中之事，《宋稗類鈔》卷四所載長沙義妓「尤喜秦少遊樂府」軼聞，皆可證「雅」對「俗」的影響；曹組的諸譜

、田中行的鄙俚、向滄的白話，亦皆可證「俗」對「雅」的浸淫；而詞由閭巷市井口頭傳唱演變為案頭筆端文人創作的史實，就是一個「雅」、「俗」聯姻互動並由「俗」趨「雅」的漫長進程。

第四，君主制中央集權的強化、科舉殿試製的確立、理學的盛行，一方面迫使文士皈依封建政教和倫理道德之「雅」，另一方面也使文士在承受思想束縛和精神壓抑之餘為求解脫而熱衷尋歡作樂之「俗」。

較唐代而言，宋代文士所受的思想束縛和精神壓抑，要深重得多。所謂言論自由，是在規定範圍之內的。《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〇云：「欲理外，先理內；內既理，外則自安。」卷三二更云：「國家若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患，皆可預防；惟奸邪無狀，若為內患，深可懼也。帝王用心，常須謹此。」學者每言宋代文官制度的成熟和完善，從某種意義上說，只是對知識階層的有效控管而已。洪邁《容齋續筆》卷二即云：「唐人歌詩，其於先世及當時事，直辭詠寄，略無避隱。至宮禁嬖昵，非外間所應知者，皆反覆極言，而上之人亦不以為罪。……今之詩人不敢爾也。」張宏先生《江湖詩派研究》附錄三亦云：「宋代號稱文治聿興，優待文人，而對知識份子的思想控制，也較之前代更為嚴密。」

趙宋對士人的控管渠道主要有兩個，一是改革科舉制度，二是確立理學的顯學、國學地位。與此相關的科舉改革措施有：一是確立殿試制，二是限定考試內容，

三是擴大取士名額，四是設立州學、縣學。殿試制使皇帝總攬取士大權，進士都成為天子門生，避免當權者利用科舉將及第者納為門生，結黨亂政。關於考試內容，自真宗後便集中於儒學，立論須根據儒家經典，不得隨意發揮；仁宗時，又在各州縣設立學校，講授儒學，作為培養士子的基礎。於是，舉子便被束縛在固定的思想框架內，應試作文重章法而輕見解，最終演變為可使用固定章法、格式的時文^⑨，成為明清八股文的雛形。而取士名額的擴大，又使更多士子落入帝王的圈套。

如果說科舉考試是禁錮士人的外在力量，那麼，作為官方意識形態的理學，則是其內在因素。理學將天理與人心對舉，凸出人心對秩序、規範的自覺和皈依，把外在秩序和規範對人的思想行為的整頓約束變為心性自覺的諧調和修養，從而為儒家倫理道德找到宇宙論和心性論的根據。這種內向型思維方式的形成，使治心養氣成為知識階層涵養心性和完善人格的重要方式，文士自覺收斂了晉、唐以來放蕩狂傲、任情率性的習氣，變得沈穩老練、循規蹈矩。顧炎武《日知錄》卷一三〈宋世風俗〉云：「宋自仁宗在位四十餘年，雖所用或非人，而風俗醇厚，好尚端方，論世之士謂之君子道長。」所謂「君子道長」，乃理學所以滋養也。

然而，人格精神的健康發展，必須以共性和個性、理性和感性的平衡與融合為前提。崇其位而不願盡其用，孤其道而不敢禁其欲，集權和理學遂成為宋代文士產生矛盾性格、分裂人格的根由。換言之，學無所用的失

望，政治思想的壓抑，自然會喚醒潛伏人們心底的叛逆情緒，使之自覺不自覺地藐視權威，沈淪世俗，放縱情欲，尋求慰藉，解釋鬱悶。

第五，宋代文士既遵奉儒學，又兼愛釋、道，對儒與釋、道關係的深刻理解和平易從事，乃是宋代文士在集權政治強化和理學思想盛行的文化背景下，自我保全，諧調「雅」、「俗」矛盾，使身心健康的發展的根本保障。

在新的政治和文化背景的影響下，出於生存和發展的需要，宋代儒、釋、道三教出現了一些共同的變化，即都從看重外部事功轉向注重內心修養，以心性為契合點，在思想的層面上進行融合。著名道教人物張伯端在《悟真篇序》中就宣稱：「教雖分三，道乃歸一。」《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四云：「上以新譯經五卷示宰相，因謂之曰：『浮屠氏之教有裨政治，達者自悟淵微，愚者妄生誣謗，朕於此道，微究宗旨。……雖方外之說，亦有可觀者，卿等試讀之，蓋存其教，非溺於釋氏也。』趙普曰：『陛下以堯、舜之道治世，以如來之行修心，聖智高遠，洞悟真理，固非臣下所及。』」卷四五又載真宗撰《釋氏論》云：「以為釋氏戒律之書，與周、孔、荀、孟述異道同，大指勸人之善，禁人之惡，不殺則仁矣，不竊則廉矣，不惑則正矣，不妄則正矣。苟能遵此，君子多而小人少。」宋代統治者對道教也同樣的崇拜，特別是真宗，幾達狂熱的程度。宋代重要的思想家，幾乎都出入釋、老。程頤《明道先生行狀》一文

就坦言其兄程顥之學「泛濫于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

宋代儒、釋、道三大文化的相容與融合，使《論語·泰伯》之「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與《孟子·盡心上》之「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這種非此即彼的傳統價值觀念和處世方式，獲得了重新整合與定位的機會，發揚淑世精神與張揚個性人格不再是不可調和的矛盾。儒家的淑世精神使宋代文士積極用世，道家任自然、輕去就的思想和佛家追求自我解脫的思想又使他們能超然對待人生的榮辱得失；個體生命的意義，既可通過社會事功來實現，也可在內心的適意自足中去求得。蘇軾《欒城集》卷二四《黃州快哉亭記》云：「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所以，宋代文士多能以一種超曠的心態坦然應對人生的起伏和塵世的滄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范仲淹《岳陽樓記》），「一蓑煙雨任平生」（蘇軾《定風波·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加上宋代文士大多興趣廣泛，飽學多能，更為他們轉移、釋放外界的壓力和內心的鬱悶，大開方便之門。宋代文士在「雅」、「俗」之間的去就往返，由此輕鬆自如。

最後，內斂的心態、高深的修養與豐厚的待遇、自由的生活相結合，使「精致」、「世俗」成為宋代文士審美意趣與生活情趣「雅」、「俗」對立統一的兩個範向或特徵。

趙宋的抑武右文國策，既是文化大豐收的沃壤，也是大量文化成果被切割閒置的鋸刀。國家軍事上的軟弱，已使宋代文人心虛氣短，缺乏唐人的矯健氣魄和民族自豪感；制度的禮遇雖使宋人有發表言論的權利，但高度的中央集權更使宋代文人匡時濟世的現實機會和實際能力銳減，滿腹經綸卻往往織成自縛或自護的繭。由變法圖強出發、以朋黨傾軋終結的政治格局，往往使宋代文人高懸起道德理想主義的雙刃劍，向極端的律己和律他進逼，個人名節重於國家利益，名臣頻出而朝政日非。結果，大量的賢能之士都不得不在世俗生活中在沈淪，假文藝、娛樂消磨他們的聰明才智，使「精致」成為與「世俗」相對的審美軒向，成為「雅」的代稱。

以上諸因素彼此促進，綜合作用，共同形成宋代文士的心理文化機制，進而影響他們的詞體觀念。與內斂、複雜的心態相對照的，是宋人物質生活的豐裕和安閒；優厚的俸祿使宋人有充分享受生活的能力，繁榮的城市更為宋人放情縱欲提供了種種誘惑和機會，文化的普及又為宋人沈淪世俗生活鋪砌好了下滑的斜坡。內斂的心態與高深的修養相結合，遂有對事理人情深刻細膩的體味，對語言技巧的嫋熟，使思想和文藝趨於精致化；豐厚的待遇與自由的生活相結合，遂有熱衷世俗的動因，並以世俗的要求推動思想文化的創新，既給傳統輸入新鮮的血液，又使民間文化獲得打磨潤飾的機會。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雅」、「俗」二元並存正是宋代思想文化包括文學轉型的標誌。宋人既有樂俗、從俗的

欲望，又有平衡、協調「雅」、「俗」矛盾的理智，集通俗性、娛樂性、抒情性和個性於一爐的詞體，於是成為首選，並逐漸被改造成既極具感染力又頗富藝術性的文學樣式，成為「精致」和「世俗」的完美結合。

三、「雅」、「俗」二元變奏對宋詞題材構成的影響

宋代思想文化的「雅」、「俗」矛盾對詞體創作的影響，至少可以從宋人用景語雅化豔情、閨情類作品，甚至為景物類題材廣辟園地、單獨培植，以及引入符合儒家詩教傳統的多種雅正莊重題材兩個方面，加以考察。

(一)以寫景之「雅」沖淡言情之「俗」，以求雅俗共賞

《宋史·歐陽修傳》云：「宋興且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鍛刻駢偶，淟涊弗振，士因陋守舊，論卑氣弱。」一些有識之士，曾對此給予尖銳的批評。趙湘《本文》一文即有言：「後世之謂文者，求本於飾，故為閱玩之具；競本（末）而不疑，去道而不恥，淫巫蕩假，磨滅聲教」同樣，宋初詞風亦承襲晚唐五代餘風，向前滑行，主要詞人如柳永、張先、晏殊、歐陽修諸人，其題材內容俗豔者居多。據筆者統計，宋代創業守成期（九六〇—一〇四一年）九六九首詞作題材構成中，居前五位的依次是豔情、閨情、詠物、寫景和閑愁，而豔情、閨情兩類即占去四六·九六%的比重。具體到柳、張、晏、歐四大詞家，則題材類型構成分別為一九類、一五類、一〇類和一四類；名列前五位者分別

依次是豔情、羈旅、閨情、祝頌和節序，豔情、交遊、閨情、寫景和詠物，豔情、祝頌、閑愁和寫景。統計顯示，雖然男女豔情、閨情、節序、閑愁和寫景。統計顯示，雖然男女遊、祝頌等詩歌中常見的題材，也占了不小的比重，表明宋詞題材類型多樣化、內容由俗趨雅的傾向從宋初即已開始顯現。

在宋初四大詞家中，柳永無疑是取材最「俗」的一位，甚至有一些猥褻之作。比如《玉女搖仙佩》：「願奶奶蘭心蕙性，枕前言下，表余深意。」《迎春樂》：「良夜永、奉情無計奈。錦被裏、餘香猶在。怎得依前燈下，恣意憐嬌態。」不過，柳詞中也有不少高雅之作；文學史上對柳詞甚至出現過兩種截然相反的評價。據張舜民《畫墁錄》記載，柳永「既以詞忤仁廟，吏部不放改官。三變不能堪，詣政府。晏公曰：『賢俊作曲子麼？』三變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殊雖作曲子，不曾道『彩線慵拈伴伊坐』。』柳遂退。」這首《定風波》之所以受到士大夫階層的鄙視和指責，就在於表現了一種市民情趣，刻畫了一種與上流社會審美意趣中溫柔嫋雅的女性形象相反的大膽熱辣的市民女子形象；又因為是即事言情，用語明白家常，缺乏傳統閨情作品的含蓄和蘊藉。相反，《八聲甘州》（對瀟瀟暮雨灑江天）卻頗受士大夫階層的稱賞。據趙令畤《侯鯖錄》卷七，東坡云：「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聲甘州》云：『霜風淒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此

語於詩句，不減唐人高處。」⁽¹⁰⁾遭貶的《定風波》屬於閨情題材，受褒的《八聲甘州》則屬寫景題材；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八聲甘州》是被看成「詩句」加以稱賞的，這就透露出要求詞體能表現詩歌的題材內容和意蘊境界的時代心音。士大夫階層在接受柳詞時表現出的矛盾性，正可反證柳詞本身所具有的「雅」、「俗」並存的事實。事實證明，柳永廣為後人傳誦的作品，往往得力於其中對景物的描寫。如《望海潮》（東南形勝）即純以繪景取勝。即使是《雨霖鈴》（寒蟬淒切）這樣的言情之作，也因為有了景物描寫，情景交融，使之在眾多艷情詞中如鶴立雞群，膾炙人口。

張先、晏殊、歐陽修諸人詞作，凡能傳誦眾口者，亦多得力於寫景。張先以善寫花月影而被稱為「張三影」；晏殊的名作如《浣溪沙》（一曲新詞酒一杯）、《鵲踏枝》（檻菊愁煙蘭泣露）、《踏莎行》（小徑紅稀）、《破陣子》（燕子來時新社）之類，歐陽修的名作如《朝中措·送劉仲原甫出守維揚》、《踏莎行》（候館梅殘）、《生查子》（去年元夜時）、《浣溪沙》（堤上遊人逐畫船）、《蝶戀花》（庭院深深深幾許）之類，或由景起興，或即景敘事，或借景抒情，或因景取譬，或寓情于景，或情景交融，無一不是得江山景物之助。

需要指出的是，當景語在篇幅上達到一定的比重，寫景就有可能從一種輔助性的藝術手法而變成佔據作品主導或主體地位的題材或內容。法國評論家保羅·瓦萊

里就曾論及風景對繪畫的滲透和支配過程：「風景給畫家提供的興趣正是這樣逐漸變遷的。最初是作為繪畫主題的補助物而從屬於主題的，後來變成了用以表現彷彿妖精也住在裏邊的幻想新天地的手段——最後迎來的是印象的勝利，素材或光線支配了所有一切。」並且認為：「我有關繪畫的描述，可以非常準確地適用於文學。就是說，所謂描寫對文學的侵略，與風景畫對於繪畫的侵略幾乎是同時進行的，採取同一方向，產生了同樣結果的。」可見文藝的演變，古今中外都有類似的規律可尋。

宋初詞體創作雅化以寫景為契入點的事實，使我們有必要從文化學的角度對「景物」作一番思考。首先，作為自然長期進化的產物，人類的生理和心理兩方面與自然的變化之間，都存在許多息息相關的對應關係。其次，人類的活動經常在自然中進行，故相關文學作品理所當然地要描寫景物。第三，人類最初的和最基本的知識大多來源於自然，故人類對自身思想感情的探究、理解，也往往需要借助於自然。第四，因為自然對人類具有無與倫比的重要性，故人類的喜怒哀樂，亦易在自然中獲得感應、撫慰和宣泄。第五，當人類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有了一定的駕馭自然的能力，也樂於把自然當作工具性的物件而加以使用。愛默生曾用充滿詩意的語言逐一論證，自然給人物用，給人美，給人語言，給人訓誡，給人理念主義，給人精神，給人前景。是的，自然無所不包，天地萬物俱生其中，是人類文明的不竭源

泉；由此出發，認識自然就是認識人自身。早在敦煌詞中，就有不少描寫自然景物的佳作。比如《浣溪沙》（五兩竿頭風欲平）、《浣溪沙》（雲掩茅庭書滿床）、《南歌子》（楊柳連堤綠）、《泛龍舟》（春風細雨沾衣濕）數闋，都是比較單純的寫景之作。另有許多作品，上片寫景，下片敘事、言情；而一般詞作中的景語，就比比皆是了。至於《花間集》，據筆者統計，寫景之作亦有一八首之多，占五〇〇首花間詞的三·六%。而到《全宋詞》，寫景詞已達一九四〇首之多，占全宋詞的九·一五%。

既然寫景是詞體的傳統，為什麼還要說寫景是宋詞雅化的途徑呢？筆者以為，這裏有一個轉折變化的問題。敦煌詞作為詞之初體，題材多樣，風格多變，可謂是一株茁壯成長的幼苗，而自然景物則是供給它健康發育的養分之一。最重要的是，敦煌詞中的寫景之作，清新爽朗，健康自然，格調天真，情思雅正。但晚唐五代時，國家瓜分豆剖，人心岌岌，土氣萎靡，反映到遣詞造句和意境的經營上，就是一種匆促與飄忽、悵惘與迷茫。比如：

灘頭細草接疏林，浪惡艤船半欲沈。宿鳥眠鷗飛舊浦，去年沙嘴是滿心。

——皇甫松的《浪淘沙》

木棉花映叢祠小。越禽聲裏春光曉。銅鼓與蠻歌。南人祈賽多。客帆風正急。茜袖偎橋立。極浦幾回頭。煙波無限愁。

漁市散，渡船稀。越南雲樹望中微。行客待潮天
欲暮。送春浦。愁聽猩猩啼瘴雨。

——李珣《南鄉子》

至於那些只為情、事而設的景語，因為附屬於人物的活動，加上作品一般採用第三人稱的寫法，就比上引數闋直接寫景，更添幾分萎靡和柔弱。故晚唐五代詞雖亦不乏寫景之作，但在時代低迷情境的籠罩下，自然景物實已失去作為審美物件所應具有的獨立品格，只是作家和詞作主人公心緒的外溢或外化，讀者往往只看到塗抹在景物外面的某種濃膩的病態情感和病態美。這就背離了儒家傳統詩教，故反不及敦煌詞的寫景來得「雅正」。晚唐五代詞寫景的「他性」和「不確定性」，實際上是當時政治動盪、人命危淺的社會現實的曲折反映。

宋王朝結束了晚唐五代干戈擾攘、儒道廢弛的局面，重新建立起更為鞏固的封建集權政體，倡文教，復儒學，崇雅之風漸進，士人的心理狀態由匆促無措變成從容優遊，重新確立起修齊治平的主體精神。這種時代精神反映到詞體創作中，便是勇於、樂於表露真實情感，行文多用第一人稱。在此背景下，宋人對詞體從晚唐五代沿襲而來的言情豔俗風尚，亦予改進；而自然景物作為人類最親近熟悉的生存基礎和文化背景，也就順理成章甚至是勢在必行地首選為改良詞風的素材和手段。經過景物描寫雅化後的豔情詞，既能滿足人們的聲色娛樂欲求，又能使這種世俗享受變得有節有度，達到「發乎

——孫光憲《菩薩蠻》

情止乎禮」的雅俗共賞的目的。至於那些單純以描寫自然景物為目的的寫景詞，更是完全意義上的雅詞，成為雅化詞體的一支生力軍。

(二)光大莊重題材，在「俗」世複墮拋荒之「雅」

如果說寫景還更多是詞體雅化的一種偏於技術性的手段，那麼，直接引入傳統文學中的那些莊重題材，以「雅」挑戰「俗」，則是宋代「雅」、「俗」矛盾在詞體創作上最為集中而鮮明的反映。

筆者曾對兩萬多首宋詞逐篇辨析，確定其題材類型，再由細到粗加以歸納，最後得宋詞題材類型三六類。按照詞學界傳統的觀點，在筆者所分三六類宋詞題材類型中，只有豔情、閨情、寫景、閑愁幾類屬於詞體的傳統題材，以這些題材為表現內容的詞作，被前人目為「婉約詞」，是詞體的正宗；其餘三十多類則是傳統詩文題材，是詩文對詞體的入侵，是「以詩為詞」、「以文為詞」，是「變調」、「變體」。而在所謂傳統題材中，只有寫景一類可稱莊重、雅正。其實，文學發展的規律告訴我們，詞體從誕生之日起，就與詩歌、散文、辭賦等文體一樣，享有表現社會人生的平等權利；只是由於晚唐五代這一特殊歷史時期的扭曲，詞體的表現功能才被極大弱化，畸形發展。比如在《花間集》五〇〇首詞中，二二三首豔情詞和一〇七首閨情詞就占去六六%的份額，而詠物、風土、羈旅、寫景、懷古等一九類詩文莊重題材作品才占三一·六%的份額。

再來看《全宋詞》。二二二〇三首全宋詞中，豔情

詞二六一首，閨情詞一七四三首，寫景詞一九四一首，閑愁詞六四〇首，四類傳統題材共六九三五首，占全宋詞的三二·七%。其他詩文類題材則共有三二類，比花間詞多出祝頌、談藝、遊仙、隱括、祭悼、仕宦、故事、世相、寓言、軍旅、生活、時事、憫農、家庭等三四類，大多是現實性比較強的題材類型，能體現儒家傳統詩教所要求的「美刺」、「比興」功能。此外，那些與花間詞重複的莊雅題材，其所占份額也大幅攀升；比如寫景、交遊、節序、羈旅、詠懷、隱逸六類，就分別上升了五·五五%、七·二三%、五·六二%、一·九〇%、四·五四%、三·五九%。所以，無論是就擴充詞體中既有的詩文類題材而言，還是就新引入詩文類題材而言，宋詞光大莊雅題材之功，都是顯而易見的；我們不妨將前一種情況稱為「擴種」，將後一種情況稱為「引種」。宋詞莊重題材的「擴種」和「引種」，都是宋代「雅」、「俗」矛盾在詞體創作上的反映，是「雅」挑戰「俗」、「雅」汰洗「俗」的具體表現。更準確地說，則是新時代背景下傳統莊重題材對晚唐五代以及宋初詞體創作豔俗傾向的矯正，是文體演變規律的必然結果。

在這場曠日持久的「題材變革運動」中，有幾位元關鍵性的詞人需要提及。其中，既有以詞見長的專業寫家，也有偶涉詞壇的業餘作者；既有被規律裹脅挾而前的不自覺的「改良派」，也有自覺自為的「改革家」。前一類作者可以柳永、張先為代表，後者可以范仲淹、

張昇為榜樣。先說「改良派」。資料統計顯示，柳詞除艷情、閨情、寫景、閑愁幾類題材外，尚有一五類題材是被一般詞論家排斥在詞體傳統題材之外的；此外，柳詞中雖只有六首詠懷詞，還不到柳詞的3%，但對於以艷俗著稱的柳永來說，乃是一個非常可貴的突破。關於柳詞的雅化問題，少數宋代學者也有比較深刻的認識。

黃裳《演山集》卷三五《書樂章集後》云：「予觀柳氏樂章，喜其能道嘉祐中太平氣象，如觀杜甫詩，典雅文華，無所不有。」張端義《貴耳集》卷上更云：「項平齋自號江陵病叟，餘侍先君往荊南，所訓學詩當學杜詩，學詞當學詞柳詞。扣其所云，杜詩、柳詞皆無表德卻從其能反映「太平盛世」方面加以肯定，可謂別具眼光。

張先是與柳永齊名的傳統所謂的婉約詞家，社會在接受柳詞時充滿矛盾，而對張詞卻是一片讚賞，當時的晏殊、歐陽修、蘇軾等人皆對其表示欽佩或讚賞。清人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卷一甚至說：「張子野詞，古今一大轉移也。……規模雖隘，氣格卻近古。自子野後，一千來，溫、韋之風不作矣。」張詞僅有一五類題材，其雅化詞體的貢獻主要表現在大量創作交遊詞上。晚唐五代以來，交遊題材罕入詞體，《花間集》中僅有六首。宋代國家統一，經濟繁榮，生活豐富，為交遊詞的興盛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士大夫俸祿優厚，假日眾多，享樂風氣流行，且宦遊四方，更成為交遊詞興盛的

直接誘因。張詞中交遊詞多達三〇首，占其全部詞作的一八·二九%，是宋代詞人頻繁社交活動的一個典型例證。

宋初另一類光大莊重題材的詞家，則是范仲淹、張昇、李冠幾位。範詞雖只有寥寥的五首，卻篇篇可觀，首首有創意。《漁家傲》、《蘇幕遮》、《御街行》三首，皆為邊塞詞，寫羈旅思歸情懷，或沈雄悲涼，或清健婉麗，剛柔互濟，情景交融。雖然從敦煌詞始，即有邊塞詞存焉；但晚唐五代詞中的所謂邊塞詞，只是套用既定的模式和現成的語彙而已，極少有作者自己的親身體驗、真實感受和人生抱負在內。只有到范仲淹這裏，邊塞詞才重又回到它應有的位置，重新放出它應有的光輝，這就是壯景、雄心與實情。王灼《碧雞漫志》卷二曾感慨：「長短句雖至本朝而盛，然前人自立與真情衰矣。」王氏語乃泛泛而論，若老范之邊塞詞，恰恰是「自立與真情」的明證。至於《剔銀燈》一闋，詠史與抒懷相結合，敘議相生，實開「以議論為詞」、「以文為詞」之先河。劉大傑先生《中國文學發展史》亦云：「如《中吳紀聞》所載《剔銀燈》一闋果為范氏所制，則蘇辛一派的詞，范實為其前導。同時，也可見他的作品，是已超越南唐的藩籬，而啟示著詞境的開拓與解放的機運了。」即使是一般論者忽視的《定風波》（羅綺滿城春欲暮）（引者按：應題《漁家傲》）一闋，在寫景中表達隱逸和入世之間的矛盾；而「鶯解新聲蝶解舞。天賦與。怎教我輩無歡緒」數句，分明是從眾生平等

、利欲天賦的哲學高度，肯定追求功名、享受歡樂都是人生的基本權利。這就比一般的寫景詞或隱逸詞有更高遠的境界、更深廣的意義。

相比之下，張昇與李冠一直受到冷落。從詞史的角度看，張昇的《離亭燕》（一帶江山如畫）不但躋身宋詞名篇之列，而且顯然有啟發王安石《桂枝香》（登臨送目）的作用。據《宋史》本傳，「昇為人忠謹清直，不可干以私」、「指切時事無所避」，謚曰「康節」；既如此人物，創作出《離亭燕》這樣的傑作就順理成章了。李冠的兩首《六州歌頭》，也是宋初的懷古名篇；其中「秦亡草昧」一闋，尤為傑出。陳師道《後山詩話》云：「冠，齊人。烏《六州歌頭》，道劉、項事，慷慨雄偉。劉潛，大俠也，喜誦之。」程大昌《演繁露》曾從音樂發展的角度，為我們解釋個中原因：「《六州歌頭》本鼓吹曲也。近世好事者倚其聲為吊古詞，如『秦亡草昧，劉項起吞併』者是也。音調悲壯，又以古興亡事實之，聞其歌，使人慷慨，良不與贊詞同科。」李冠現存詞作風格多近張先，《六州歌頭》之作雖與該調的音樂特質有關，但能于婉約綺麗中別取質地豪放的懷古題材，無論是就其本人還是就整個宋初詞壇來說，都有突破和開創之功。

在避「俗」趨「雅」的大趨勢中，也有以「俗」為能、以「俗」為樂的人物。比如北宋徽宗年間，政治混亂，世風淫靡，國將不國，俚俗之詞大昌。王灼《碧雞漫志》卷二「各家詞短長」條言之甚詳：

沈公述、李景元、孔方平、處度叔侄、晁次膺、萬俟雅言，皆有佳句，就中雅言又絕出。然六人者，源流從柳氏來，病於無韻。雅言初自集分兩體，曰雅詞，曰側豔，目之曰勝萱麗藻。後召試入官，以側豔體無賴太甚，削去之。……田中行極能寫人意中事，雜以鄙俚，曲盡要妙，當在萬俟雅言之右。然莊語則不佳。……長短句中，作滑稽無賴語，起於至和。嘉祐之前，猶未盛也。熙豐、元祐間，兗州張山人以詼諧獨步京師，時出一兩解。澤州孔三傳者，首創諸宮調古傳，士大夫皆能誦之。元祐間，王齊叟彥齡，政和間，曹組元寵，皆能文，每出長短句，膾炙人口。彥齡以滑稽語噪河朔。組潦倒無成，作《紅窗迴》及雜曲數百解，聞者絕倒，滑稽無賴之魁也。黃綠遭遇，官至防禦使。同時有張袞臣者，組之流，亦供奉禁中，號曲子張觀察。其後祖述者益眾，嬉戲汙穢，古所未有。組之子，知閑門事勸，字公顯，亦能文。嘗以家集刻板，欲蓋父之惡。近有旨下揚州，毀其板云。

此外，曾敏行《獨醒雜誌》卷五亦云：「先君嘗言，宣和間客京師時，街巷鄙人多歌蕃曲，名曰《異國朝》、《四國朝》、《六國朝》、《蠻牌序》、《蓬萊花》等，其言至俚，一時士大夫皆能歌之。」可見，無論是坊間或是士流，都有「俗」詞滋生、發育的條件。不過，俚俗文學的作者雖然常給人們帶去歡樂或笑料，甚至可以供奉帝王左右，但他們的政治地位和社會聲譽並不高。上引曹勳掩其父曹組創作俗詞之舉即為一證。」

續墨客揮犀》卷六所載方圭「好為惡詩」而遭群僚嘲諷，又是一證。說到底，中國封建社會畢竟是以儒教為思想支柱，「雅」永遠是官方意識形態的主旋律。

經過宋初兩類詞家自覺和不自覺的共同努力，詞體創作終於開始擺脫鄙俗風氣的束縛，邁步走向廣闊的社會現實。到北宋中期，又經過王安石，特別是蘇軾的大力拓展，詞體最終成為「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劉熙載《藝概·詞曲概》）的一種新詩體，回歸其本位，在文體大家庭中爭回它應有的席位和尊嚴。

注釋

- ①「德」恩格斯著：《致約瑟夫·布洛赫》，《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七卷，第四六一—四六二頁。
- ②夏承壽著、吳無聞注：《瞿髯論詞絕句》，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第七〇八頁。
- ③張希清撰：《北宋貢舉登科人數考》，《國學研究》第二卷，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五年。
- ④「明」陳邦瞻編：《宋史紀事本末》卷二《收兵權》引呂中語，中華書局一九七七年，第一〇〇—一頁。
- ⑤「元」脫脫等撰：《宋史·選舉志序》，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第三六〇四頁。
- ⑥「清」王夫之撰：《宋論》卷一《太祖四》，中華書局一九六四年版，第六頁。
- ⑦張毅著：《宋代文學思想史》，中華書局一九九五年，第一七〇一八頁及第三一頁。
- ⑧「清」王夫之撰：《讀通鑑論》卷二五，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版，第七五六頁。
- ⑨「宋」歐陽修撰：《居士集》卷一二《送楊君之任永康》，商務印書館一九五八年重印本《歐陽永叔集》（上），第八四〇八五頁。
- ⑩「宋」王安石撰：《臨川先生文集》卷七三《答曾固書》，「四部從刊」本。
- ⑪「宋」趙湘撰：《南陽集》卷四，《四庫全書》本。轉引自柄谷行人著：《日本現代文學起源》第一章《風景之發現》，三聯書店二〇〇三年版，第一五〇一六。
- ⑫「元」馬端臨撰：《文獻通考》卷三二《選舉考五》引甯宗慶元四年言者語云：「經義一科，全用套類。父兄相授，囊括冥搜；片言隻字，不脫毫分；溢篋盈箱，初無本領；旅進場屋，鮮有出於揣似之外。天下士子，誰務實學哉？」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版，第三〇二頁中。
- ⑬吳曾《能改齋漫錄》卷一六謂為晁補之語：「無咎評本朝樂章，不見諸集。今錄於此。云：『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聲甘州》云：「霜風淒慘，關河冷落，殘照當樓。」此唐人語，不減高處矣。』」